

# 试论埃里克·沃格林的“政治宗教”理论

刘沐恩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

**摘要:**《政治宗教》是沃格林学术生涯早期的代表作,通过“政治宗教”的理论视角考察了纳粹德国的历史根源、符号特征与世俗宗教本质。学术界围绕“政治宗教”的理论内涵与学术价值展开了大量的争论。然而,若要恰当地评估“政治宗教”则需要澄清该理论所遵循的理论基础及其所体现的特征与性质。首先,“政治宗教”的特征体现在其“符号—经验”的分析模式中;其次,该理论是沃格林探究纳粹德国政治危机的新视角,也是沃格林“精神政治学”的理论雏形。在明确“政治宗教”的特征与性质之后,进而可以恰当地阐明该研究对当今学界诊断社会政治危机与探索良善秩序的启迪意义。

**关键词:**沃格林;“政治宗教”;纳粹德国;政治危机;良善秩序

## 一、引言

埃里克·沃格林(Eric Voegelin, 1901—1985)是20世纪最重要的政治哲学家之一,他的成名作《新政治科学》(1952)与《秩序与历史》(五卷本,1956—1987)已为学界熟知,其理论价值也得到

---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埃里克·沃格林的秩序理论研究”(23CZZ050)的阶段成果。

高度认可,而沃格林学术生涯早期的代表作《政治宗教》(1938),尽管是学界较早研究纳粹德国的作品之一,其所阐发的“政治宗教”理论却并未得到学界足够的重视与恰当的研究。<sup>①</sup>

《政治宗教》甫一面世便引发学界争议,其中托马斯·曼(Thomas Mann, 1875—1955)的评论最著名也最具代表性,他批评沃格林对纳粹德国的分析缺乏果断而明确的道德谴责。<sup>②</sup> 德奥合并之后逃亡到美国的沃格林迅速作出回应,他认为,只对纳粹德国进行道德谴责是不够的,因为道德非难会弱化人们对更深、更危险之恶的关注,他还指出,纳粹德国及其意识形态涉及宗教根基,利用了宗教的结构与符号(symbol)元素,并以此作恶施暴。因此要对抗这种类型的恶,不能仍旧遵循进步主义将其视作“野蛮人”的政治态度,而必须寻求同样性质、同等程度的善之力量作支撑。<sup>③</sup> 然而不久之后,《政治宗教》遭纳粹查禁而在学术视野中消失,更深入的理论探讨也因而停滞。

1986年,库珀(Barry Cooper)将《政治宗教》翻译成英文并重新引介到学术界,此后针对“政治宗教”理论的探讨再次热烈起来,相关探讨涉及该理论的概念术语、理论内涵及其学术价值。首

① 基于下文沃格林的分析可以看出,其意在强调人类生存秩序中,政治与宗教经验不可分离的特征。基于此, *Die Politischen Religionen* 的汉译书名似乎应该采用“政治宗教复合体”更合题意,因为汉译《政治宗教》强调的是政治属性的宗教,而不是政治宗教复合体。此外,在满足行文简洁且不损害文意的前提下,可以省略“复合体”,因此,恰当的汉译应该是“政治宗教”。文中所引沃格林文本,英文版参考 *The Collected Works of Eric Voegelin* (Vol. 1—34) (《埃里克·沃格林作品集》34卷[1989—2008]), 以下简称为《作品集》,英文名称简称为 *CW*; 德文版参考 Eric Voegelin, *Die Politischen Religionen*, Herausgegeben und mit einem Nachwort versehen von Peter J. Opitz, Periagoge, Herausgegeben von Peter J. Opitz in Verbindung mit dem Eric-Voegelin-Archiv, München. 若需要涉及其他版本或者译本时,均会于相应脚注中说明。下文脚注形式示例: *The Collected Works of Eric Voegelin*, Volume 1, p. 1 简称为 *CW*, 1: 1。

② Thomas Mann letter to Eric Voegelin (December 18, 1938), in Voegelin Papers, box 24, file No. 11. See Voegelin's reply to Thomas Mann in ca. 1939. Details please see *CW*, 29: 203.

③ *CW*, 33: 2, 19—23.

先,学者们越来越重视该理论在沃格林学术事业中的重要地位。<sup>①</sup>比如,沃格林研究专家桑多兹认为,沃格林后来所有著作的核心依据显然是他在《政治宗教》中所展示的论证之根源<sup>②</sup>,也即《政治宗教》中所涉及的问题与研究意图与沃格林后期成熟作品并无二致。此外,里拉也认为,沃格林所有主要作品的萌芽都可以在《政治宗教》中找到。<sup>③</sup>李强在分析沃格林的《政治观念史稿》时也将《政治宗教》作为沃格林学术生涯早期代表作进行了简要梳理。<sup>④</sup>

其次,学者们还就“政治宗教”的理论内涵进行了更广泛而深入的探究。代表性的肯定评价包括波特和罗德之的研究。波特认为,沃格林早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就阐释出了纳粹主义的基本原理,其将纳粹主义运动阐释为现代灵知主义(Gnosticism)运动,有效地解释了该运动得到民众支持的原因。<sup>⑤</sup>罗德之则认为,该研究揭示出纳粹政权与因灵魂堕落而丧失超越维度的独裁统治、激进的启示论意识形态本质上的一致性。<sup>⑥</sup>批评者则认为,“政治宗教”这一术语所指不明,其概念有待明确。例如,布瑞就不赞同沃

① 1986年,在库珀的引介下,《政治宗教》一书重新在英语世界流通。该译本基于1939年的德文版译出,并附有库珀所写的导言和译者前言。詹姆斯·罗德之(James M. Rhodes)认为该英译本存在诸多错误。1993年,该书德文第三版以及意大利译文版陆续面世,1994年其法语版面世。2000年,《政治宗教》由亨宁森(Manfred Henningsen)重新编辑并撰写导言,收录到《作品集》第五卷《没有约束的现代性》之中。2007年,该书的中译本出版问世,中译本是以《作品集》为蓝本,由张新樟与刘景联共同翻译。

② “That central ground of all his later work is clearly at the root of his argument in *The Political Religions*.” Details, see Ellis Sandoz, *The Voegelinian Revolution: A Biographical Introduction*,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 65.

③ “The germ of all Voegelin’s major works is to be found in *The Political Religions*.” Details, see Mark Lilla, *The Shipwrecked Mind: On Political Reaction*, New York: New York Review Books, 2016, p. 33.

④ 李强:《西方政治秩序演变的历史分析——沃格林〈政治观念史稿〉述评》,《政治思想史》,2021年第1期,第5—7页。

⑤ Clifford F. Porter, “Eric Voegelin on Nazi Political Extremism,”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Vol. 63, No. 1, 2002, pp. 151–171.

⑥ James M. Rhodes, “Review: The Young Voegelin on Religion,” *The Review of Politics*, Vol. 50, No. 4, 1988, pp. 747–749.

格林的结论与态度,在他看来,沃格林将埃及法老政权和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民族国家置于一个主题之下是不合适的。布瑞还指出,现代的政治宗教概念是世俗化不可避免的后果,而世俗化被沃格林视为秩序不断堕落的结果。<sup>①</sup>

最后,就“政治宗教”概念引发的争议而言,有学者注意到沃格林既不是“政治宗教”术语的首创者,也并不热衷于使用这一概念。<sup>②</sup>除了《政治宗教》一书中的内容之外,沃格林在其他地方只提到这一概念两次。<sup>③</sup>而沃格林之所以放弃这一概念,贡捷认为原因有二:首先,极权主义诸形态是假的宗教,因为它们切断了与超越存在者的关联;其次,“宗教”术语本身模棱两可。<sup>④</sup>针对这一术语困境,贡捷认为,更恰当的术语是宗教虔诚(*religiosity*)或者灵性经验(*spiritual experience*)这样指意更明确的术语。沃格林不再使用“政治宗教”这一术语,并不意味着他放弃这一概念。贡捷认为,沃格林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一直秉持着下述观点:政治生存牵涉神圣维度,而纳粹统治也掺杂着经过改造而腐化的精神内涵与行为。<sup>⑤</sup>事实上,沃格林在其《自传性反思》(1989)中也曾谈及《政治宗教》中所涉及的问题,他认为:“(该研究)诠释并非全错,但我不会再使用宗教这一术语,因为它太过含糊,并且(它)将经验与教

① Philippe Burrin, “Political Religion: The Relevance of a Concept,” *History and Memory*, Vol. 9, No. 1/2, 1997, pp. 321–349.

② “政治宗教”这一术语并非沃格林原创,而是源于鲁吉尔(Louis Rougier)等人的研究。在沃格林之前已经有部分学者使用“政治宗教”这一术语,相关文献参见 Emilio Gentile, *Politics as Religion*, G. Staunton tran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6。此处所涉及鲁吉尔的研究出自沃格林的自述。参见 Eric Voegelin, *Autobiographic Reflections*, in *CW*, 34: 78。

③ Thierry Gontier, “From ‘Political Theology’ to ‘Political Religion’: Eric Voegelin and Carl Schmitt,” *The Review of Politics*, Vol. 75, No. 1, 2013, p. 25, Footnotes 2.

④ Thierry Gontier, “Totalitarisme, religions politiques et modernité chez Eric Voegelin,” in *Naissances du totalitarisme*, Philippe de Lara ed., Paris: Cerf, 2011, pp. 157–181.

⑤ Gontier, “From ‘Political Theology’ to ‘Political Religion’: Eric Voegelin and Carl Schmitt,” p. 25, Footnote 26.

条或教义问题混淆,从而曲解了关于经验的真正问题。”<sup>①</sup>沃格林的上述回应包含两层含义:一方面他仍旧认可将纳粹德国及其意识形态运动视为“政治宗教”的分析视角;另一方面,他也察觉到了其中的问题:除了“宗教”一词含义不明外,最重要的问题在于以“宗教”分析诸意识形态及其社会政治运动容易混淆经验与教条问题。

以上针对“政治宗教”理论的讨论涉及它在沃格林学术事业中的定位、该理论的有效性以及相关概念的界定等议题,这些研究使得“政治宗教”理论重新得到学界关注;但是,上述研究并未重视沃格林以“政治宗教”理论视角分析纳粹德国的创新性,也未能更深入细致地分析该理论的特征、性质与学术价值。就厘清围绕“政治宗教”的理论阴霾而言,沃格林的上述回应为理解与评估其理论价值提了一个可资借鉴的参照,即考察“政治宗教”是否以及在何种意义上真实地反映了人类生存的秩序经验。为此,一方面需要阐明“政治宗教”的理论内涵与叙事逻辑,进而指明其特征在于运用“符号—经验”法则(symbol-experience formula)分析人类历史中的社会政治秩序现象<sup>②</sup>;另一方面需要将“政治宗教”置于沃格林学术生涯早期其他相关作品所形成的语境中,并结合他思想成熟时期对人类生存秩序的思考,以彰显该研究的性质、学术定位及其对学术界思考秩序问题的启迪意义。

## 二、“政治宗教”的理论内涵、符号要素与历史视野

“政治宗教”研究的诞生既有现实社会政治的紧迫性,也有学理上的必要性。面对愈演愈烈的欧洲社会政治危机,诸理论流派提出了观点各异的疗治方案,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理论范式是启蒙主义视角下的进步主义。进步主义者将纳粹斑斑劣迹解释为文明社会倒退到了野蛮人时代。沃格林质疑进步主义理论家们的主张,他认为,纳粹德国及其意识形态植根于启蒙时代以后的社会政治观念与运动中,吸收了大量现代元素,具有现代世俗宗教的特征。而

<sup>①</sup> *CW*, 34: 78-81.

<sup>②</sup> 参见 *CW*, 34: 99-100。

这些特征表明文明与野蛮的分析框架不堪使用。<sup>①</sup>因此,上述社会政治与学术语境刺激着沃格林寻找诊断纳粹德国的新方案,其结果便呈现在“政治宗教”理论中,就其所运用的分析视角而言,该研究是沃格林在反思欧陆社会政治理论弊病基础之上所进行的新探索,即以表达秩序的符号分析人类生存秩序的经验;就其所分析的对象而言,它是沃格林对纳粹德国现象的深刻反思与积极回应。

“政治宗教”之所以可以被视为沃格林剖析欧洲社会政治危机的新方案,原因在于该研究有其独特的理论预设及分析方法。就理论预设而言,在沃格林看来,人的政治生活是一个包含世俗与宗教领域的复合体,正如沃格林在《政治宗教》的结语中所言:

人们在政治共同体中的生活不能被定义为纯粹世俗的领域,在其中我们仅关注法律问题和权力组织。一个共同体也是宗教秩序的领域,并且在决定性的问题上,如果出现以下情况,那么关于政治境况的知识将会是不完整的。首先,如果它不考虑一个社会中固有的诸种宗教力量以及表达这些力量的诸种符号;或者,其次,如果它确实包括这些宗教力量,但并没有如实地将之视为宗教力量,而将其转化为非宗教(areligious)范畴。人类生活在政治共同体中,带有他们存在的(从肉体到精神和宗教的)所有特征。<sup>②</sup>

从上述引文可以看出,沃格林认为人的政治生存带有其存在的所有特征。人类完整的政治境况是一个包含多个领域的复合体。因此,若要探究人的生存境况,则不能只关注一个领域,更不能以这一个领域及其符号表达方式代替多领域复合体。此外,沃格林对符号概念有独特的理解,他认为,符号是人类表达生存经验的语言现象,它产生于人参与存在共同体(the community of being)<sup>③</sup>的过程中,这种参与具有居间(in-between)与相遇的特征。具体而言,沃格林认为:

符号是参与式经验过程中产生的语言现象。表达经验的语言符号并非内在世俗化之人类意识的发明,而产生于上述经验过程本身。因此,语言参与到了意识的居间特征(the metaxy character)

① *CW*, 33: 2, 19-23; *CW*, 5: 23-25.

② *CW*, 5: 70.

③ *CW*, 14: 39-41.

之中。符号既不是人类表示意识之外现实的惯有记号，也不是如某些神学体系中展示的上帝之言，这些上帝的话以适宜的方式在接受者能够理解的语言形式中传播。相反，它产生于神圣与人性之间的相遇（the divine-human encounter），因此，它同等程度地参与到神圣与人性的现实之中。<sup>①</sup>

在此理论预设的基础上，沃格林以表达诸领域生存经验的诸符号为研究对象，通过考察符号的历史起源、演变以及分化，以求理解人类的政治生存。以下分析将遵循沃格林的上述理论前提，考察他通过“政治宗教”的理论视角对纳粹运动代表性符号的历史追溯，以展现该视角的具体内涵、理论特征与叙述逻辑。

在阐述纳粹运动代表性符号的变迁之前，沃格林首先对现代西方社会政治理论中将“国家”与“教会”分离的做法提出了质疑，并引入“政治宗教”作为替代性的分析范式。<sup>②</sup>从西方历史上看，政治与宗教是一个整体内相互作用的两个元素，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西方帝国体系的衰退以及现代民族国家的兴起。此后，“政治宗教”就被分离为“政治”与“宗教”两个独立的实体并遵循两种精神。“宗教”意味着“教会组织，基督信仰以及其他救赎宗教”；“政治”意味着“国家事务以及现代民族国家类型的政治组织”。<sup>③</sup>此外，随着国家及其世俗精神在反抗神圣罗马帝国过程中控制了政治权力领域，而教廷依旧把持着宗教领域，两套相应的语言符号体系被发展出来，分别被用来为政治与宗教冲突中对立的双方辩护，而现代的认知深受上述两套概念体系相分离做法的影响。

通过以上历史梳理，沃格林提出，政治与宗教现象是紧密相连、频繁互动的一个揭示人性力量的整体。<sup>④</sup>国家与宗教概念不能完全区分，对“政治宗教”的恰当理解须涵盖救赎性宗教现象以及世俗国家现象。一方面，“国家”具有“宗教”性本质；另一方面，

① *CW*, 34: 99-100.

② 为求引用一致，行文简洁，下文凡涉及《政治宗教》之处，未特别说明者，德文版主要引用由奥皮茨（Peter J. Opitz）重新编辑出版的德语第三版，英文版主要引用《作品集》第5卷的版本，中文版则引用张新樟等翻译的版本。

③ *CW*, 5: 27-28.

④ *CW*, 5: 27.

“宗教”具有世俗政治组织的特征。因此,对政治危机的考察,须从“政治”与“宗教”两方面入手。

此外,沃格林还根据历史上出现的宗教现象将“宗教”概念区分为两类:一类是超越世俗的宗教(trans-worldly religions),意为在世界根基中、在超越世界之上寻找最高实在的精神性宗教;另一类是内在于世俗的宗教(inner-worldly religions),意指在世界之内寻找神圣现实的宗教。<sup>①</sup>沃格林对政教分离原则的质疑是基于历史考察,但更是其理论预设之必然结果,若要完整地考察人类生存状态,则政治与宗教领域缺一不可。

在厘清“政治宗教”符号的应有之义后,沃格林开始考察其在历史上的演变并追溯其起源。在沃格林看来,最早的“政治宗教”形态是古埃及法老阿肯那顿的宗教改革运动。然而仅仅追溯“政治宗教”的历史起源,并不足以弥合其初始形态与其现代极端形态之间的鸿沟,也无法了解其结构中诸构成要素的发展过程。这些要素不仅仅参与了历史上“政治宗教”诸形态的构成,其本身亦作为符号表现形式展现了不同时代的生存经验。这些经验在历史情境中既展现在政治层面也展现在宗教层面。为此下文将归纳出构建“政治宗教”所必须的代表性符号要素。

第一个重要的符号要素是神圣层级(the sacral hierarchy)。沃格林认为,作为统治合法性的基本形式,等级制的基本原则是权力之流(the stream of power)从顶部的神圣之源(诸神、上帝、祖先、圣物)通过中介者(部族首领、国王、皇帝、神父、先知)延伸到最低等级的臣民(subjects)那里。<sup>②</sup>根据沃格林的分析,正是法国思想家博丹(Jean Bodin, 1530—1596)对等级制符号进行理性化论证,并使之由神圣且神秘的教义转变成一个“理性的秩序”,开启了向现代形态的转型。这个“理性的秩序”包含国家内法律体系里

① *CW*, 5: 33. 可以看出,沃格林此时对宗教现象的分类稍显简单,此后他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并在其《自传性反思》中对“宗教”符号以及其他相关问题做了进一步区分,详情参见下文相关段落分析。沃格林的反思参见 *CW*, 34: 77—79。需要强调的是,沃格林的两类宗教区分法的重要性在于,它是沃格林区别超越信仰行为与宗教运动以及类宗教的社会政治运动(意识形态运动)的标准,也是区分社会政治秩序与失序的重要标准之一。

② *CW*, 5: 42.



的每一个层级。沃格林认为,由博丹完善并合理化的等级制符号成为了“欧洲内在世俗化国家秩序结构”的主要等级类型,直到“新的世俗化法律等级理论”<sup>①</sup>传播扩散开来才将其取代。世俗国家内部的政府和官僚等级体系随着“斩首上帝”行动而进一步发展与世俗化,此后,这种世俗化的等级制度不断寻求其他符号体系的帮助以求得自身合法性。<sup>②</sup>

第二个重要的符号要素是共同体的自我认同(the self-identification of a community)。在沃格林的分析中,历史中的世俗政权虽然拥有等级制符号——其中权力之流从顶端的上帝一直延伸到民众——但是这个等级制并非封闭的,因为它仍然通过中介者与超越的上帝(秩序的神圣根基)联系在一起。就博丹式等级制的表现来看,政治制度变得多层次化和理性化。同时,每个个体作为基督徒都有权直接求助于上帝。尽管上述个体直接追寻神圣根基的权利在最理想的情境下也不能被完全保证,但神圣权力之流从源头直抵最底层的可能性依然存在。此后,政治组织关闭与神圣根基的联系、国家主权之世俗秩序被神圣化,以及对超越世俗之上帝的斩首行动已然开启。要达到上述目的,就必须将这个共同体阐释为“一个依赖于自身而存在的实体”<sup>③</sup>。为此,则需要将共同体的世俗层面与超越精神层面相分离,因此,将政治共同体中政治与宗教分离开来的需求便愈发强烈了。

第三个重要的符号要素是政治共同体的分离与封闭。按照沃格林的阐述,神圣共同体之内精神与世俗层面的分离在形成内在世俗实体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历史上发生的政教分离现象为斩首超越世俗的神圣根基以及随之而来的政治共同体的封闭化铺平了道路。随着历史和社会形势的变化,政治组织日益发展壮大并积极寻求其独立权威。沃格林认为,腓特烈二世(Frederick II)作为一个强大的世俗国王及皇帝的崛起,标志着基督教世界内部第一个内在世俗之“政治宗教”的建立。<sup>④</sup>

① *CW*, 5: 43.

② *CW*, 5: 43.

③ *CW*, 5: 47.

④ *CW*, 5: 50.

第四个重要的符号要素是历史中的启示(apocalypse in the history)。沃格林论述道,上文对“政治宗教”所涉及的符号要素的分析是基于外部视角,也即基于基督教组织的视角,在这种视角中人类历史被视为一个政治与宗教结合的共同体诸符号不断分化与精细化的结果。然而要推进上述分析,还须从各个符号之内考察,也即分析牵涉其中的个人的自我理解以及权力的流动,也即当时的人如何回答其生存的意义这一令人焦虑的问题。为达上述目的,沃格林选取基督教启示这一重要符号要素进行分析。<sup>①</sup>在分析了约阿希姆(Joachim of Fiore)的第三王国启示论之后<sup>②</sup>,沃格林指出,上述关于人类历史的启示与中世纪的符号主义一起为“现代政治宗教中的启示论王朝”<sup>③</sup>奠定了历史基础。同时,基督教修道运动,也即所谓的“新宗教”,使得寻求完美生活与灵魂重生成为了人们此世生活的一部分。在现代,“精神存在的完美”、世俗和政治生活的净化,已成为“自文艺复兴之后的内在世俗化运动”最重要的动因之一。<sup>④</sup>秉持类似完美主义教条的诸学说在现代开始风行。例如,对人类理性的完美主义信仰;人类在启蒙运动中永恒进步的理论;黑格尔和孔德哲学中的历史进步主义;纳粹运动所鼓吹的第三帝国理论。而为了实现此世的完美生活,先驱、领袖以及同志团体的地位在各种意识形态以及相应的社会政治运动中变得越来越重要。<sup>⑤</sup>

### 三、“政治宗教”的现代极端形态:利维坦与纳粹德国

在历史的过程中,构成世俗化封闭社会的诸要素相继呈现,然而,在其展现出纳粹式最恶劣的形态之前,仍需要有人将不同要素

① *CW*, 5: 51. 基督教启示指向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神以基督的生、死、复活、升天以及他的再来和审判,构成了启示核心。

② 第三王国启示彰显着圣灵的时代来临,这将是一个“全新的秩序”(ordo novus),因为万民将成为“上帝的新子民”。参见刘小枫:《约阿希姆的“属灵理智”与“历史终结”论》,《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第19页。

③ *CW*, 5: 52.

④ *CW*, 5: 52.

⑤ *CW*, 5: 52.

整合到一个理论体系中,这种整合的过程不仅仅是将相关符号要素拼接在一起,而且需要创造出一个全新的符号体系。它既能容纳上述发展成熟的符号要素,也能为共同体提供一个崭新且理论自洽的自我理解方式。在沃格林看来,霍布斯创造的利维坦符号不仅仅是绝对君权的理论体系,更是封闭世俗宗教形态发展的重要一步。利维坦是直接处于上帝之下,按神圣秩序运作的全能国家(omnipotent state)。<sup>①</sup>

依沃格林之意,霍布斯的利维坦符号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收缩了基督教会开放结构。虽然等级形式仍然上达上帝,国家也以上帝的委托而建,但是,等级制停止于共同体而不再下至共同体中的个人;等级制延伸到主权者那里,但是主权者不是被视为臣民的统治者,而是被视为国家的人格承载者。霍布斯的主权契约宣布国家是“凡间上帝”<sup>②</sup>,人类将其和平和安宁归功于利维坦,而它也被视为是仅次于“不朽上帝”的人间上帝。此时的政治共同体是一个封闭的体系,这不仅体现在政治权力上,也体现在思想上。因为主权者(无论它是一个君主还是一个议会)有权评判哪些观点和教导是适合维护和增强国家统一性的,主权者有权审查任何出版物。<sup>③</sup>

在沃格林的分析中,当神圣层级、共同体的自我认同、政治共同体的分离与封闭、历史中的启示等要素都已经具备之后,霍布斯的利维坦这个特殊的异教符号体系在整合各个符号要素的基础上发展成为一个封闭的世俗教会体系。此时,在人之生存经验中,超越之上帝被替换为世俗事物,超越的维度丧失,存在的秩序难以以为继。<sup>④</sup>再没有神圣之流从最高源泉处渗透下来,教会作为一个世间组织成了最基本的神圣本质。沃格林所说的向“存在的飞跃”(leaps in being)被阻隔,即人们以理性(noetic)与灵性(pneumatic)的方式探寻秩序神圣根基已无可能。<sup>⑤</sup>

根据沃格林的阐述,在此后的历史过程中,尽管“政治宗教”具

① *CW*, 5: 53.

② 托马斯·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132页。

③ *CW*, 5: 54.

④ *CW*, 17: 291-301.

⑤ 埃里克·沃格林:《城邦的世界》,陈周旺译,译林出版社,2010年,第88页。

体的表征发生了变化,但其基本特征与要素已呈现在作为现代版本“政治宗教”的利维坦中。准确地讲,一些符号在现代社会中呈现出了新的内容与意义,例如普遍教会转变成了一个独立、封闭、世俗和自我认同的政治实体。统治权威来源由世俗教会所凭借的“上帝的命令”变为纳粹主义运动中所谓的历史使命和“血腥命令”。<sup>①</sup>

沃格林认为,当封闭的社会完全摒除了先验的神圣秩序之源而依靠自身独立存在时,生存于其间的人变成了神圣的“内容世界”的纽带。人们的行为准则,“他们身体与精神的生存”就与整个共同体的生存状态关联起来。<sup>②</sup>生存于封闭社会之中的人将与之紧密关联的封闭实体视为唯一现实。更为严重的是,当个人接受了封闭社会中的价值标准时,他将把自己视为整个共同体的一部分,作为集体组织的一个工具。沃格林进而论述道,这些个人由此构成了共同体的神秘身体,所有个人都合并为一个身体、一个人格和一个国家。在历经从古代与中世纪论述中攫取思想资源,从现代意识形态运动中获得动力的漫长过程之后,那种将个人转变为共同体一部分的思想与政治运动终于在现代意识形态斗争中开枝散叶,并结出纳粹德国政权这一恶果。沃格林批评说,历史中的这种思想倾向都是对个人“人格尊严”的犯罪。然而,这些学说并没有被批判分析,也没有得到抑制,反而被提倡并被塑造成为“实现人与上帝之间宗教—信仰纽带”的新方式。<sup>③</sup>

依据沃格林所言,整个内在世俗的封闭社会形态(“封闭的世俗教会”)在20世纪构建和推广了他们的事业,也即法西斯主义意大利和纳粹德国。他们中的意识形态专家通过吸收“德国浪漫主义”运动的养分来发展并且合理化其语言和意识形态。在他们的理论中,神圣的“实质”(substance)变成了意大利的“民族精神”和德国的“客观精神”。<sup>④</sup>

上述两个“政治宗教”的极端形态,尤以纳粹德国政权最具代表性,它不仅吸纳并改造了“政治宗教”所需的诸元素,最重要的

① *CW*, 5: 59.

② *CW*, 5: 64.

③ *CW*, 5: 64.

④ *CW*, 5: 65.

是，它继承了“政治宗教”现代雏形利维坦中的封闭社会政治结构。共同体成为了“凡间的上帝”，它不再需要借助超越维度的秩序之源为其存在提供依据，生存于其中的个人只能依靠封闭的共同体，而不再能通过永恒的神圣存在获得个人心灵秩序。

如上文所述，利维坦与纳粹德国政权同属现代版本的“政治宗教”，在本质上都是世俗封闭的“政治宗教”符号体系。<sup>①</sup>但是两个符号体系中的具体符号要素已然为适应具体情形发生了变化。因此，以下内容将依据沃格林的分析展示纳粹德国政权结构中诸符号要素的构成特征，从而直观地展示“政治宗教”现代极端形态的真实面貌。第一个重要的构成特征是人民的突显。人民是一种集体人格，因为它被描述成“统一的人民”，个人合并成为一个统一共同体。第二是共同体的人格承载者的变化。它曾经源于共同契约，就像利维坦中的主权者一样。如今它由选举产生，被称为人民的同志或者是领袖(Führer)。这个承载者被视为与人民的精神与意志相连，并且选举承载者不再是出于利维坦中所描述的因人们害怕自然状态而产生的理性结果，而是纳粹意识形态中宣称的人民精神需要寄托者。例如，在纳粹德国的宣传中经常涉及“元首是人民的代表”(The Führer was the representative of the people)。第三是人民精神之实现方式的确立。人民精神并非平等地展现在人民的每一份子中，而是完全展现在一个人格之中，展现在领袖一个人身上。人民的精神与意志仅通过领袖行事，并通过领袖得以成为历史社会的现实。第四是超越之上帝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世俗之神”。为说明世俗之神的权威及其代表者的顺从，沃格林举例类比道，封闭世俗之神对元首说话如同超越之神向亚伯拉罕说话一般。第五是纳粹德国与意大利法西斯政权在实际层面的区别。就纳粹德国而言，德国人民的精神是基于血统，而领袖是人民的代表，因为他与人民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就意大利而言，意大利的人民精神拥有更多宗教精神基础。<sup>②</sup>

① 沃格林将利维坦与纳粹德国政权归为本质一致的符号体系是值得商榷的，相关分析参见沃格林在《自传性反思》中的自我反思以及下文对“政治宗教”的理论评估。

② CW, 5: 65-66.

总之,以上内容从符号分析的视角,阐释了沃格林对“政治宗教”之构成要素以及整体面貌的分析。从中可以发现,沃格林对纳粹德国及其意识形态运动的探究呈现出一个丰富而新颖的图景。一方面,纳粹德国表征的“政治宗教”所用符号形式、建构的结构形态并非无迹可寻,因为其结构与诸要素都出现并发展于西方历史的不同阶段;另一方面,纳粹德国政权本质上有别于其他“政治宗教”形态,它将统治转化为激进主义政治运动,最高世俗统治者成为了运动的领导者,封闭性质的世俗共同体重新创造出永恒的使命。

#### 四、“政治宗教”的性质及其启示

就“政治宗教”的性质而言,该理论从属于沃格林学术生涯致力于阐明的“生存政治学”,是其重要理论运用。前文梳理表明,沃格林已经认知到已有理论流派无法用来分析纳粹德国现象,更遑论救治病症,恢复秩序。基于此理论流弊,沃格林博采欧陆英美哲学之长,试图诊断政治危局,并探索政治秩序研究的新思路。<sup>①</sup>事实上,沃格林的上述理论反思与探索早在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就已经开始,他当时致力于发展新的政治理论<sup>②</sup>,其所倡导的新政治理论核心在于关注“人之生存”。沃格林曾在一份遗稿中阐发其新政治理论的核心议题,他认为:

① 就智识资源而言,沃格林的秩序思考吸收了不同哲学流派的成果,这其中包括德国阐释学、哲学人类学、现象学和存在主义哲学以及经验主义。

② 例如:Eric Voegelin, „Zur Lehre von der Staatsform,“ *Zeitschrift für öffentliches Recht* 6, no. 4, 1927, S. 572–608; Eric Voegelin, „Herrschaftslehre,“ in Voegelin Papers, box 53, folder 5,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Stanford, Calif.,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in *CW*, 32: 224–372; Eric Voegelin, „Rechtslehre,“ in Voegelin Papers, box 53, folder 5,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Stanford, Calif.,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in *CW*, 32: 373–413; Eric Voegelin, „Staatslehre als Geisteswissenschaft,“ in Voegelin Papers, box 53, folder 7,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Stanford, Calif.,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in *CW*, 32: 414–429; Eric Voegelin, „Grundbegriffe der Staatslehre und des österreichischen Verfassungsrechtes,“ in Voegelin Papers, box 53, folder 19,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Stanford, Calif.

有意识地转向思考人类生存问题(zur geisteswissenschaftlichen Betrachtung)是艺术,文学以及宗教研究中的普遍现象,政治理论中的这一转向才刚开始,而本研究的导论则旨在概述德国政治理论的现状,并试图解决关注人类生存的问题。<sup>①</sup>

沃格林将其所推崇的社会政治理论称为生存科学/精神科学(Geisteswissenschaft),其政治学则可以被称为生存政治学/精神政治学(Geisteswissenschaftliche Staatslehre)。<sup>②</sup>格布哈特将其解释为“经验阐释理论”(empirical-hermeneutic theory),也即结合了德国阐述学传统与英美经验主义的社会政治理论。<sup>③</sup>格布哈特认为,“精神政治学”其核心原则首先是自我理解与自我反思(Selbstverständnis und Selbstbesinnung),其次是心灵或灵魂的开放(openness)。根据格布哈特的解读,灵魂开放原则意在整合“自我反思式沉思的认知与存在诸层面”<sup>④</sup>,因此,可以认为,沃格林所强调之向超越敞开的原则意味着考察社会政治秩序时需要深入分析该秩序是否依旧向存在根基或神圣秩序之源敞开。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政治宗教”理论从属于沃格林学术生涯早期的理论探索,也是其“生存政治学”的代表性初始形态,因为该研究关注的是人类生存中的秩序,其所遵循的阐释方式是“符

① Register of the Eric Voegelin Papers, 1901-1997, Box 53, Folder 7,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Stanford; *CW*, 32: 417.

② 一般而言,“Geisteswissenschaften”可以被直译为“science of human mind”,也即“心灵/精神科学”,它是德国的大学传统,基本涵盖人文社会科学各分支学科。此外,“Geisteswissenschaftliche Staatslehre”可以被直译为“以心灵/精神为核心的政治理论”,考虑到沃格林所构思的新政治理论意在关注人类生存状态,尤其关注不同现实中的人对自身生存的意识与理解并在此基础上创造的社会政治秩序,恰当的翻译应该是“人类生存政治学”或“生存政治学”,因为它突出了沃格林政治理论转向的核心意涵。

③ Jürgen Gebhardt, „Was ist der Gegenstand einer empirisch-hermeneutischen Theorie des Politischen?“ *Politische Theorie-heute: Ansätze und Perspektiven*, Michael Th. Greven und Rainer Schmalz-Bmns Hrsg. 1. Aufl. Baden-Baden; Nomos Verl. Ges., 1999, S. 101-119.

④ Jürgen Gebhardt, “The Vocation of the Scholar,” in *International and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on Eric Voegelin*, Stephen A. Mcknight and Geoffrey L. Price ed., Columbia: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1997, pp. 10-34.

号—经验”法则,所关注的核心主题是各具体历史境况中的个人与共同体对其生存状态的自我理解,而这些主题都是沃格林“生存政治学”的题中之义。然而,通过上述分析也可以发现“政治宗教”研究存在一些有待澄清的疑点。比如,沃格林反对将政治与宗教相分离的分析视角,试图将宗教/精神领域诸现象重新带回现代政治领域的做法,便遭到学者们的质疑,其中,凯尔森的批评最具有代表性。<sup>①</sup>此外,“政治宗教”所涉历史现象过于庞杂,其所进行的符号分析与比较并不清晰。例如,所涉及的社会政治现象并非都是人类生存经验的自我理解,不同现象之间的关系也有待进一步澄清。然而上述问题并不能掩盖“政治宗教”的理论价值,其理论潜力与难题反而激发沃格林继续开展新的理论探索,以回应上述难题。例如,沃格林在《新政治科学》导言中发展了自我理解的原则以筛选历史上呈现出的诸多符号体系。<sup>②</sup>他在《秩序与历史》系列研究中提炼并广泛运用“符号—经验”法则,同时发展出紧凑与分殊的维度以衡量符号的发展程度,从而避免“政治宗教”理论中将埃及古老宗教、中世纪宗教符号、启示论、现代符号利维坦与纳粹德国的符号体系融于一炉的问题。<sup>③</sup>

就“政治宗教”的启迪意义而言,该研究有助于每一个社会政治共同体及生活于其中之人理解社会政治危机并寻求良善秩序。沃格林借助“政治宗教”理论分析具体社会、政治、历史环境中的人之生存问题,具体而言,他考察了欧洲历史中导致纳粹德国崛起的各类符号化表达背后所蕴含的人之生存经验。换言之,沃格林认为,纳粹德国崛起是心灵腐化、封闭化之后相关社会政治运动发展的极端状态,也是从封闭心灵到封闭世俗社会运动的恶果。其“政治宗教”研究不仅仅意图阐明世俗封闭性质的意识形态及其社

① Hans Kelsen, *Secular Religion: A Polemic Against the Misinterpretation of Modern Social Philosophy, Science and Politics as "New Religions"*, Wien and New York: Springer, 2012, p. 271; Bjørn Thomassen, "Debating Modernity as Secular Religion: Hans Kelsen's Futile Exchange with Eric Voegelin," *History and Theory*, Vol. 53, No. 3, 2014, pp. 435-450.

② *CW*, 5: 88; 109-112.

③ *CW*, 14: 39-50.



会运动的历史根源与构成要素,也在此基础上反思人类生存境况的变化:危机的呈现与秩序的恢复。具体而言,“政治宗教”中涉及的以下理论内容值得借鉴。

首先,关注社会政治共同体的智识状况。依沃格林之见,封闭世俗社会的深厚认知基础自中世纪以来就已建立,即把世界视为生存事实与因果知识的汇总。以关于世界内容的知识遮蔽对世界本身的认识,并抛弃了关于神圣秩序的所有认识。沃格林指出,人们虽然可以增加关于世界内容的知识,但却不能掩盖人类生存状况,人类灵魂深处的焦虑依然存在。当超越上帝消失时,内容世界成为新的神秘存在;当超越的宗教符号被禁止时,新的符号又会从世俗的科学语言中出现并取而代之。沃格林认为,康德阐述的世界观就具有上述含义,但是康德从个人的不朽中找到了出路,并且他的启示包括了全人类。而其他的启示者则把他们的符号理论局限于某个特殊的共同体。例如,费希特的启示限于日耳曼民族,孔德的启示落脚在实证主义精神体现者的身上,至于其他的种族理论家们则更是将其启示的承载者视为某些特定的种族。沃格林对世俗封闭社会智识状态的描述也是每个人关照自身所处共同体的一面镜子,以此可以查看政治及社会状态。

其次,注重历史探究以及超越经验。沃格林曾经提到研究现代西方社会政治失序的恰当方式是在空间上对现实的探究必须扩展到不同文明;在时间上必须追溯意识形态及其社会政治运动在数千年文明进程中的起源。就主题而言,这一探究范围需要包含宗教,超越经验及其符号、政府制度以及人们个性的转变和对暴行的适应。<sup>①</sup>另外,沃格林认为对秩序的探究,需要时刻关注人的生存本身,尤其是人的心灵是否朝向真理开放,即灵魂中是否还保持着对超越真理的追求。他指出,人类在政治社会中带着他们存在的所有特征:从肉体特征到精神特征再到宗教特征。政治共同体总是要融入到上帝和世界的总体情境之中,因此对失序的研究不应该局限于制度层面,而应该深入考察精神与心灵秩序的根

<sup>①</sup> 埃里克·沃格林:《评阿伦特的〈极权主义起源〉》,陈高华译,载李强主编:《民主与现代社会》,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71—276页。

源。有学者质疑沃格林对人类生存失序现象的研究缺乏科学性,更像是传统基督徒的信仰告白<sup>①</sup>,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涉及到如何理解沃格林所述的超越经验这一概念。但仅就“政治宗教”的主旨而言,沃格林所言对超越经验的开放态度并非信仰告白,而是沃格林从人之生存及其自我理解的经验出发,将灵魂秩序纳入到秩序分析中。

## 五、结 语

总之,“政治宗教”理论是沃格林视野广阔、内涵丰富的研究成果,它诞生于沃格林对欧陆社会政治理论研究纳粹德国的反思之中,而其所运用的“符号—经验”阐释原则着眼于人类社会政治生存过程中的秩序经验及其符号表达。它以全新的视角审视生活于具体社会政治情景中的人及其活动:人不再被当作被观察的客观对象,而是对其生存拥有自我理解与符号化表达能力的主体。此外,“政治宗教”也昭示着对人类社会政治危机的考察以及对秩序的追索,一方面将呈现为融合社会政治历史诸领域的综合研究,另一方面,也将呈现为关注人之心灵朝向与自我理解的意识研究。因此可以说,“政治宗教”是沃格林探索出的诊断纳粹德国、寻求秩序的新方案,它可以被视为沃格林学术生涯致力于发展的“生存政治学”之理论雏形。这样的研究对学界诊断社会政治危机与探索良善政治秩序颇具启迪意义。

(责任编辑 董成龙)

---

<sup>①</sup> 迈尼尔认为,沃格林涉及基督教信仰的著作,不能被视为其信仰告白,而应该被理解为沃格林对宗教问题的开放态度。参见 Gerhart Niemeyer, “Christian Faith, and Religion, in Eric Voegelin’s Work,” *The Review of Politics*, Vol. 57, No. 1, 1995, pp. 91–104.

## An Interpretation of Monroe's Message (1823)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scursive Formation and Conceptual Structure

Fu Wenguang

**Abstract:** In 1823, the Monroe Message clarified and revealed the identity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space and time coordinates, and it was also the “diplomatic independence declaration” issued by the United States as a self-proclaimed great power. As a concise and elastic expression of American nationalism, the Message contains elements of “spatial-geographic reasoning” (realpolitik) and “normative reasoning” (idealism). In addition, the “Message” to elaborate “non-colonial”, “us and others” and “war or force as a defense mechanism” and other norms through the “Doctrinaire” way, laid the ideological foundation for a series of major foreign policy actions in the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meaning, logical approach and conceptual structure of the text of the “Message” is helpful to rethink the fundamental significance of the United States as a liberal “ideal-type” political body and its internal relationship with the evolution of the moder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ystem.

**Key words:** Monroe's Message; Monroe Doctrine; discourse rhetoric; ideology; history of diplomatic thought

## On Eric Voegelin's Theory of “Political Religion”

Liu Muen

**Abstract:** *The Political Religions* is the representative work of the young Voegelin. It examines the historical origins, symbolisms, and the nature of the secular religion of Nazi Germany by employing th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of “political religion.” Considerable debates have been launched in academia concerning the theoretical connotation and importance of “political religion.” However, a proper evaluation of “political religion” requires further clarification of its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characteristics, and nature. Firs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olitical religion” are reflected in the “symbol-experience” formula involved in its analysis. Second, the theory is Voegelin's new perspective to explore the severe crisis of Nazi Germany and a prototype of his *Geisteswissenschaftliche Staatslehre*. After revealing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nature of “political religion,” it is possible to properly clarify the significance of this theory in diagnosing socio-political crises and explore the good order in times of chaos.

**Key words:** Eric Voegelin; “political religion”; Nazi Germany; political crisis; good order